

侗苗 文坛

MIAODONGWENTAN



1988年6月创刊

1992

4

苗 侗 文 坛

总第16期

桃园深处是侗乡

——《侗歌研究》引论

..... 侗族 邓敏文(1)

古代越人民歌略论

..... 林蔚文(10)

试论侗族与古越人的关系

..... 陈业銓(21)

韦明秋

苗族与悬棺葬

..... 苗族 吴善淙(31)

古州龙舟活动调查

..... 苗族 杨元龙(36)

侗族还愿文化考察与断想

..... 侗族 龙 迅(48)

鄂西苗俗拾零

——还大牛愿简介

..... 天 平(59)

草标浅说

..... 苗族 文朝汉(63)

侗族的织绣艺术

..... 侗族 傅安辉 (69)

新时期民族戏剧的自我审视

——浅议侗戏艺术发展的走向

..... 侗族 梁维安 (77)

苗族诗歌句末声律汉译浅谈

..... 苗族 礼 酒 (87)

侗台语族亲属关系漫谈

..... 侗族 杨汉基 (106)

孙应鳌的中庸观与中庸哲学的“合理内核”

..... 王治新 (118)

侗族大文化研究的奠基篇

——《侗族文化概论》读后

..... 侗族 张人位 (135)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本期执篇 棠 华

桃源深处是侗乡

《侗歌研究》引论

○ 侗族 邓敏文 ○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365——427）在他的著名散文《桃花源记》中讲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东晋孝武皇帝司马昌当政期间，有一位以捕鱼为业的武陵人沿着河溪行船，也不知走了多远，忽然遇见一片鲜花盛开的桃树林。桃林分布在河溪两岸足有好几百步。桃树林中没有一棵杂树。树下的青草嫩绿鲜美；树上的鲜花缤纷堕地。捕鱼人感到十分奇怪，便继续往前走，他打算走到这片桃林的尽头。过了桃树林，他来到了水的源头。这里有一座山，山中有一个洞口，洞里仿佛有亮光。捕鱼人弃舍鱼船，便从这个洞口走了进去。起初洞口很狭小，只能一个人通行。走了几十步之后，突然变得开阔敞亮起来。这里有广阔平坦的土地，有宽敞明亮的房屋，还有稻田、鱼池、桑树、竹子等等。田间小路纵横交错，鸡啼狗吠遥相呼应。只见耕田种地的人来来往往。男人和女人穿的衣服，完全像另外一个世界。老人们面

带笑容。孩子们蹦蹦跳跳，都表现出十分快乐的样子。他们遇见了捕鱼人，都很奇怪。有位长者问捕鱼人：“你从哪里来呀？”捕鱼人认真地作了回答。这位老人便邀请捕鱼人来到自己的家里，并杀鸡摆酒热情地款待他。村子里的人们听说来了这样一位客人，都赶紧前来问候。村民们自我介绍说，他们的祖先因为躲避秦朝的战乱，带领妻子、儿女和城里人一起来到这个与外世隔绝的地方，以后再也没有出去，从此便同外边的人断绝了来往。捕鱼人又问他们知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朝代？他们连什么是汉朝都不清楚，更不知道还有什么魏朝和晋朝了。捕鱼人把自己知道的事一一地向他们讲述，他们既惊叹又惋惜。于是，村子里的其他人也纷纷邀请捕鱼人到自己的家里作客，都摆出丰盛的酒肉和饮食。捕鱼人住在那里住了几天，便打算向村里人告辞回家。临别时，有一位村民对捕鱼人说：“你没有必要将这里的情况告诉外人。”捕鱼人走出洞口，找到了自己的渔船，便按照他来时走过的路处处留下了标志。他回到武陵郡的治所（即今湖南省常德市），便立即到郡太守那里如实地禀报了这件事情。太守又立刻派人跟随捕鱼人前往探察。他们沿路寻找先前留下的标志，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现。他们再也找不到原来的那一条路了。

当时有一位名叫刘子骥（即刘麟之，字子骥，《晋书》有传）的南阳人，这个人喜欢游山玩水，当他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非常高兴。于是，他订了一个计划，打算亲自到桃花源去看一看。结果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不久他就病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提起这件事情了。

除散文《桃花源记》外，陶渊明还在《桃花源诗》中对这个“世外桃源”的社会风情作了更具体的描绘，如“相命

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班白欢游诣”，“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等等。

除陶渊明外，也还有其他一些文人墨客写过一些关于“桃花源”的诗词。如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等，坚持变法的北宋大改革家王安石（1021——1086）也曾在他的《桃花行》中写过这样的诗句：“避时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食实枝为薪。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鱼郎漾舟迷远近，花间相见惊相问。世上哪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

关于《桃花源记并诗》的写作动机及社会背景问题，许多专家学者研究认为：这是“以避秦比避宋。”如明代文人黄文焕在《陶诗析疑》中称：“以避宋之怀避秦也”。再如清代文人余良栋所修《桃源县志》称：“惟不仕伪宋一说，深得靖节本旨。”又如清代学者翁同和称：“义熙十四年，刘裕弑安帝，立恭帝，逾年晋室遂亡，史称义熙末，潜微著作佐郎，不就。桃花源避秦之志，其在斯时与？”（见清代姚培谦编《陶谢诗集》）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桃花源记》是根据民间故事改编创作而成，其理由是：“《桃花源记》又见《搜神后记》，《搜神后记》所载多为民间故事。”（见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桃花源记》注①）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桃花源”纯属一种幻想，人世间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如清代文人沈德潜在其所编《古诗源》中称：“此即羲皇之想也。必辨其有无，殊为多事。”

我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桃花源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不可能完全出自陶渊明个人或其他人的想象。此事必定是作者目之所见或耳之所闻。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说的“武陵人”即是西汉及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时期的武陵郡人，其治所在今湖南省常德市，其所辖地域含今黔东南和湘西南大部分侗族地区。陶渊明是今江西九江人，曾任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职。他生前是否到过武陵地区，我们现在已无从考辑，但他所描述的“世外桃源”，不能说和武陵地区无关。今桃源县位于湖南省常德市西南，属沅江下游，境内有名胜风景区“桃花源”，唐时建有寺观，并有刘禹锡、王维、李白、孟浩然等诗人题咏。溯沅江而上，经过沅陵、辰溪，便可进入侗族人民今日的聚居之地沅江上游，其中包括巫水、渠水、溇水和清水江流域。我们称这里为北部侗族地区。这里溪河交错，山川秀丽，地形复杂，素有“南楚极边”和“百越襟喉”之称。南朝（宋）范晔（398——446）所撰《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初，楚顷襄王（公元前298年——前263年）遣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檣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关于庄蹻（即庄豪）领军入滇的路线问题，《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是“循江上”。但是，当时秦已征服巴蜀，溯长江而上再入滇似乎已不可能，故《华阳国志》及《后汉书》均谓“从沅水伐夜郎”。这个说法比较合理。屈原在《离骚》中也说：“济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由此可见，溯沅水过黔中入滇，是楚人最习惯走的道路，也是古人从中南通往西南的一条文化长廊。今天的湘黔铁路，也是从这一地区穿过的。

凡去过湘西南或黔东南侗族地区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

感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许多侗族村寨，都分布在丛山峻岭之间的小盆地中或河溪两岸较平坦的台地上。侗语称这些平地为“便”（dianv），即“坝子”。坝子与坝子之间山高林密，只有小河小溪才能绕山而行或者穿山而过的水道，古称“溪洞”。

在我的家乡贵州省黎平县城东北14公里处的高屯乡弯寨南侧，有一座“天生桥”，《黎平府志》载：“天生桥崇严直跨两岸，中有一洞，双江口诸水（均属沅江支脉）经此达高屯，可以行舟，上侧仍然平地也，往来甚便，不假修筑之力，故名。”此桥最宽处138米，最窄处98米；弓形高进水面39米，出水面34米。远远望去，巍然矗立，奇绝壮观。小时，老师曾带我们去参观过此桥，身临其境，真有如《桃花源记》中所述：“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侗族古称“洞人”、“洞民”或“峒氓”。唐代杰出政治家、哲学家和文学家柳宗元（773——813）因与刘禹锡等人参加王叔文、王伾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在柳州期间，他颇著政绩，并写了许多反映当地风土人情的诗篇，其中有一首题为《柳州峒氓》，诗曰：“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鹅毛御腊缝山罽，鸡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问重释，欲投章甫作文身。”柳州即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柳州市，位于都柳江中下游，也是古代侗族人民的安身之地。侗族古歌《从前我们做大款》说过这样的话：“从前我们做大款，头在古州（今贵州省榕江县）尾在柳州（即今广西柳州市）。由此可见，柳宗元所说的“峒客”，

不能说与今日的侗族无关。

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侗族是古代越人的后裔。战国末期，今湖南省西南部的越人被称为“西瓯”人或“骆越”人。《逸周书·王会解》卷七有“区阳以鳖”的记载。古时“区”与“瓯”通，《说文》解：“区，踦区藏匿也。从品，在匚中。品，众也。”（晋）杜预注《左传·昭公七年》《卷44，页11）有“作仆区之法”的记载。孔颖达疏引服虔云：“仆，隐也；区，匿也。为匿亡人之法也。”《荀子·大略篇》载：“言之信者，在乎区盖之间。”所谓“区盖之间”，就是指藏匿物品的地方。由此可知，无论是“区阳”人或是“西瓯”人，都具有“隐匿之人”或“藏匿之人”的意思。

侗族人民至今仍自称为“宁更”（nyen^{nc}gueml），“宁”就是“人”，“更”在侗语里就是“隐匿”、“藏匿”或“掩蔽”的意思。如“更霸”（gueml^{bal}），即用许多树枝放进鱼塘里，使鱼有藏身之处。“更困”（gueml^{kuenp}），即用荆棘将道路掩蔽起来，防止人畜通行，使庄稼或其它物品不受侵害。“更虾”（gueml^{xaih}），即用树枝、荆棘或石头将村寨周围封闭起来，不许生人随便入，以维护村民们的安全。由此可见，所谓“宁更”（侗族），也是指“隐匿之人”或“藏匿之人”。这些他称或自称，同《桃花源记》中所述“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大概不会没有关系。

由于侗族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黔、湘、桂边界），离中心城市都比较远，地形比较复杂，交通很不方便，加之历史上又属于楚文化和越文化的交接点，所以明清以前的封建

王朝虽然在这里曾建立过郡县或州县，但多为“入版图者存虚名，充府库者亡（无）实利。”直至清朝末年，许多边远的侗族村寨仍然处于“千人团哗，百人合款，纷纷籍籍不相兼统，徒以盟诅要约，终无法度相縻”的原始村社状况。

（见刘欣：《渠阳边防考》）民国《三江县志·民间规约》载：“款，团约也，俗习即以之称团。柳州志谓广西民兵曰款，指团练也。旧志称集款，则凡关于执行团约皆习用之。远在前清嘉道以前，由来久矣。相传本县平江区在昔自治自卫之组织。悉遵周夫六郎二人所订之二十一条款为法则，相沿至今，每遇集众或起团，皆曰‘起款’。以后浔江之九合局，及河里等村之联团，或曰大款，或曰扩大款。盖自此始，凡团组成，款议定，皆共同遵守，并服从款首之指挥。每遇巨大事变，即以鸡毛火炭置信封中（实为钉木牌上一引者注），为传发之紧急信号，（条款谓之飞牌）闻者不避风雨，星夜奔赴指定地，如期而集者常逾万人，莫敢或后。此种组织，尤以侗族之历史为悠久。”同书卷二载：清光绪三十年（1904）浔江、武洛河、林溪河、猛江沿岸各侗族村寨联成大款，“其条款更前完备，而遵守者殆普遍于全县矣。”1910年发生在广西怀远县（今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寨的反对封建政府开征“新厘”的斗争；1919年发生在贵州省黎平县竹坪寨的“三十六人”抗枪事件等等，也都是以联款的组织形式进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侗族人民同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但也仍有许多侗族村寨的封闭状况在长时间内未被打破。如1963年夏天，我考上了中央民族学院。启程赴校的那一天，寨子里的父老乡亲都来送别，有的送粽子，有的送鸡

蛋，有的送草鞋。一位60多岁的老人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你要多换几双草鞋，听说北京离我们这里远得很哩，也不知道要走多少天才走得到。”我说：“不用带草鞋，我是坐车子去，不用走路。”他又问：“坐车子有骑马快吗？”我说：“坐车子比骑马快多了，车走一天，马要走十多天。”他又问：“坐车子要走几天才能到北京呢？”我说：“包括坐汽车和坐火车，大概要走六、七天。”（当时湘黔铁路尚未修通，必须走凯里到谷硐上火车，再经柳州、衡阳去北京。）他听了以后惊呼：“那走路不是要几个月才能走到呀？听老人们讲，走九天九夜就可以走到天边，到北京要走几个月，那不是比天边还要远呀？过了天边，还会有路吗？”我说：“不但有路，而且那里的路比我们这里的路宽多了，平多了。”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无知的悲哀和求知的欢乐，就是这样在这个古老边远的侗族山寨里长期并存，直至今天仍尚未完全消逝。这就是侗族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世外桃源”。

闭关锁族的自然经济使侗族地区长期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的状况。这种状况又是侗族地区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也是侗族人民贫穷困苦的主要原因。如果说，“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也是我们民族的一种传统，那么这种传统在现实生活中已经不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观念。眼下，改革开放的大潮已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处于“桃源深处”的侗族山乡，也迫切需要外来商品经济和文化的冲击。对传统进行改革，充分利用侗族地区现有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向国内外、海内外的朋友介绍侗族，以激起他们到侗族地区考察、旅游和投资的兴

趣，发展民族经济文化，这是当前摆在我们侗族人文科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繁重而光荣的任务。

我们是居住在“桃源深处”的侗族子孙，我们的祖祖辈辈就在这块富饶而又神秘的土地上繁衍生息。这个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世外桃源”是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它的内部组织结构及其演变过程究竟怎样？在“虽有父子无君臣”的历史状态中人们究竟依靠什么手段来管理生产、管理生活和管理社会？当我们迈步走进富丽堂皇而又千奇百怪的文化人类学的殿堂门口时，我们就立志要写一部关于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专门著作，试图以此来回答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那样一些问题。

我们认为，“款”是侗族古代社会中最重要 的组织形式，具有原始氏族社会和原始部落联盟的许多特征。它行使着国家出现以前或国家权力之外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一切管理权力和管理方式，其中包括基础的和上层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家庭的和社会的、生产的和生活的等等。“款文化”是侗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侗族传统文化有别于其它兄弟民族传统文化的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因此，这本著作就定名为《侗款研究》。

在《侗款研究》中，我们将以侗族的款文化作为观察、分析和论证的主要对象。同时，我们也将论述款文化与其它侗族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并努力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追溯它们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去观察它们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和作用，去思考它们未来的变化前景。总而言之，我们将用自己的手和自己的笔，写下一个“桃源深处的居民”——一个有文化的侗族子孙的所见、所闻、所感和所思。

〔责任编辑 陶光弘〕

古代越人民歌略论

○ 林蔚文 ○

商周秦汉时期，中国南方百越民族族群庞大，分布广泛，民族文化绚丽多彩。越人的民歌就是百越文化中颇具特色的一朵奇葩。

在漫长的生活岁月中，古代越人这个能歌善舞的南方土著民族，在经历社会变革、军事争斗、劳作艰辛、原始祭祀、男女恋情、生离死别、欢乐哀怨等种种情形时，人们往往能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一首首或哀怨徘徊、或委婉动人，或激愤震撼人心的民歌油然而生。

先秦以来，中国的一些古籍对越人的民歌多有记载并不乏赞叹之辞。如《吕氏春秋·音初》说：“禹行水，窃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这首民歌，只有短短四字，其中还有两个感叹虚字助词，但正由于有了“兮”和“猗”这两个感叹虚词，整句歌就显得感情丰富，一唱三叹，让人听了回味无穷。也正因为如此，《吕氏春秋》才给予极高评价，认为是“实始作为南音”。关于涂山的地望，几千年来众说纷纭，大致上有越之会稽（绍兴）、淮南寿春、当涂及豫之嵩县等说法。考之《越绝书》等记载，禹在会稽（绍兴）或皖南等地的行踪比较可靠^①，因此涂山女的这首歌，不管在浙江或皖南所唱，

番禺越地，秦皇时无歌。近西说：郑司马述伯采番州民二
变如春秋前后，南越人因歌在齐楚乃至中原内地都享有盛誉，非
《萍踪》“招我”以“昆侖仙棹”，龚大匠笑（余）之句。云《艺
文类聚》以越王孙明所作歌有“婕妤辞琴瑟，前画龙舟
荆烟和菱曲，幽夜唱江南”等句间。^②晋荀勗《情世越人歌》知其
就建康作，建康于公元前解所船从楚国南渡至海子处即兴献唱
幽望舟武衡^③。秦汉时期，越人民歌便传唱于南方广大僻壤
地方至于中原内地，迨及汉萧史乘肩假造教使使玉商曾“穿
长安城隅内游水往第中内内划行船以辟羽盖，緇濯越歌”^④
颜师古注云：“此诗与《离骚》、《九章》、《楚辞》、《大招》、《招魂》、
执揖棹人为越歌也。”而襄樊等地则尚随之俗，犹如《交州记》
所载：“俗好鼓琴，牧豎于野泽，以箫笛鸣琴弄之，乃歌，乃舞，衣
月下，抚掌发烈谣。”^⑤西汉闽越统治下的闽北山区，曾广泛
流传“李寄斩蛇”的传说，当地越人因此也编有歌谣传唱。晋
人干宝《搜神记》在详记其事，最后乃说：“其歌谣至今
存焉。”^⑥可惜的是《搜神记》未将歌谣的具体内容记下。

根据刘向《说苑·善说》、赵晔《吴越春秋》，干宝《搜神记》等早期古籍记载，我们大致可知古代越人的民歌创作多姿多彩，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格调清新，现大略归纳如下。

一、韵味无穷的《候人之歌》。如上述,《吕氏春秋》记涂山女翘首远望切盼禹归的“候人兮猗!”一声“兮猗”,韵味无穷,令人感受到了涂山女对远离家门的大禹的深切思念之情,候人候到无限期,因此只好借助“兮猗”深深感叹来表达自己的心愿,这歌辞来自上古夏禹时代,因此真可谓“实始作为南音”。

二、拥楫游乐的颂唱民歌。据西汉刘向《说苑·善说》记载，公元前528年（楚平王元年），楚国贵族子晰发动政变成功后，泛波游乐，兴之所致，令划船的越人为之“会钟鼓之音，拥楫而歌”，由此就产生了著名的《榜枻越人歌》。其歌词曰：“滥兮草朴滥予。昌恒泽予？昌州州湛。州焉乎秦胥胥。纍予乎昭秦踰渗。堤随河湖。”⑥一曲歌了，鄂君子晰不解其意，乃令旁人曰：“吾不知越歌，予试为我楚说之。”于是旁人乃将越语译为楚语，其歌词曰：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歌词表达了拥楫而歌的越人歌手此时此刻受宠若惊和奉承阿谀的复杂心情，另一方面，又反映了越人歌手即兴演唱的高超水平。

三、触景生情的亡国哀歌。春秋末年，吴越争霸，越王勾践兵败稽山，此后勾践率人入吴为奴，此即历史上著名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缘起。据《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记载，在勾践等人乘船入吴时，勾践夫人“顾乌鹊啄江渚之虾，飞去复来”，自由飞翔，而作为君主的勾践此时却失去自由，沦为亡国奴，触景生情，不觉悲中从来，哭而歌之曰：“仰飞鸟兮鸟鳬，凌云虚兮翩翩，集州渚兮优恣，啄虾矫翻兮云间，任厥国兮往还。妾无罪兮负地，有何靠兮谴天。与风独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懨懨兮若割，泪泫泫兮双悬。彼飞鸟兮鳬鸟，已迴翔兮翕苏，心在专兮素虾，何居食兮江湖。徊复翔兮游猗，去复返兮于乎！始事君兮去家，终我命兮君都。终来遇兮何幸，离我国兮去吴。妻衣褐兮为婢，夫去冕兮为奴。岁遥遥兮难极，冤悲痛兮心恻，肠

千兮服膺，于乎哀兮忘食。愿我身兮如鸟，身翱翔兮矫翼，去我国兮心摇，情愤惋兮谁识！”一曲歌了，坐在船侧的越王勾践“心中内恻，悲伤之情油然而生，此歌可谓亡国奴悲哀心情的生动写照。

四、感伤而吟的《何苦之歌》。越王勾践在吴为奴三年后，被吴王夫差遣送回国。在此期间，勾践卧薪尝胆，意在复仇。为迷惑吴王，勾践令国中越女日夜采葛纺织以献吴王，越女感伤勾践的良苦用心，乃作《何苦之歌》：“葛不连蔓**茶**台。我君心若命更之，尝胆不苦甘如饴，令我采葛以作丝。女工织兮不敢迟，弱于罗兮轻罗縠，号絺素兮将献之，越王悦兮忘罪除、吴王欢兮飞尺书，增封益地赐羽奇，机杖茵褥诸侯仪，群臣拜舞天颜舒，我王何忧能不移！”

⑦这首民歌生动表达了越女对勾践良苦用心的感伤之情。

五、远离故乡的思乡之吟。越王勾践在励精图治、振兴越国社会经济期间，还令国中壮年男子数千人入山伐木。这些长期离乡的越人思乡心切，于是吟唱思乡曲《木客吟》。

《木客吟》歌词在《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中未见记载，但其大致内容如《水经注》所说，“勾践使工人伐柴楮欲以献吴，久不得归，工人忧思，作木客吟。”⑧可知这首失传的思乡之吟，在吴越民歌中也有其代表意义。

六、生离死别送别的之歌。越王勾践在东山再起行将伐吴之际，召集军队与父老乡亲壮别。在这生离死别的场合中，“国人各送其子弟于郊境之上，军士各与父兄昆弟取诀，国人忠哀，皆作离别相去之词。”歌词曰：“踈蹢摧长慝兮，擢戟馭戔，所离不降兮，以洩我王气苏。三军一飞降兮，所向皆殂。一士判死兮而当百夫。道裕有德兮吴卒自屠。雪我

王耻宿兮，威振八都。军伍难更兮，势如貌猊。行行各努力兮，于乎！于乎！”⑨这悲壮的诀别之歌，引得“观者莫不凄恻。”

七、以歌代答的渔父之歌。春秋时期，楚臣伍子胥遭楚王迫害逃亡吴越。在逃至吴楚边境时，伍子胥遇一江中渔父，即呼为渡，但此时旁有人窥视。渔父见状，乃作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伍子胥闻之，即止于芦边静候。稍顷，渔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事寝急兮当奈何！”子胥闻之，乃急上船过渡，顺利逃离险境。渔父因搭救伍子胥怕累及身后，乃自沉于江兮而亡。⑩此处的渔父之歌，可谓以歌传意的杰作。

八、缠绵悲恻的恋情之歌。据《搜神记》记叙，吴王夫差有女名紫玉，年十八，才貌俱美，与童子韩重相恋，重使父母求婚，夫差怒而不允，紫玉结气死，葬阖门之外。韩重哭泣哀恻，具牲币，往吊于墓前。紫玉魂现，乃左顾宛颈而歌曰：“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既高飞，罗将奈何？意欲从君，谗言孔多。悲结生疾，没命黄垆。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长，名为凤凰，一日失雄，三年感伤。虽有众鸟，不为匹双。故见鄙妾，逢君辉光。身远心近，何当暂忘。歌毕歔歔流涕，要重还家……”⑪此歌尚见载《乐府诗集》，题为《紫玉歌》。

需要指出的是，赵晔《吴越春秋》写于东汉时期，其依据的史实主要来自《左传》、《国语》及《史记》三书。其时去古未远，赵晔本身即浙江越地人，有关吴越争斗的文献资料和民间传说在当时应可多见，且于赵本人也当熟知。因